国学 文化周刊

“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

■陈 来 李 卓

唐君毅先生（1909—1978），已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才智高明，学殖丰赡，造诣圆熟，成就卓著。他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第三代新儒家余英时、杜维明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唐先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尽心竭力，死而后已，为当代儒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他1949年以后的中文著作原皆在港台印行，十多年前大陆的两家出版社曾部分引进，现在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新编的唐君毅全集的简体字本，这是唐学研究的要事和喜事！

《唐君毅全集》1989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分三十五种，三十卷，除末两卷外，余皆唐先生亲自著述，凡一千万言。此次新编，在初版的基础上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特别是新增了一些资料，新撰了唐先生的年谱、图传以及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新版全集为我们研究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学者的唐先生提供了丰富全面的材料。

在这三十余卷的皇皇巨著当中，《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具有核心的价值和地位，其他著作多与之密切相关。唐先生临终前半月（1978年1月15日）为该书第十版写的序言中自述，他在港台出版的著述约分四类（也可大致看作他毕生所撰的分类）：“一类为吾在大陆之时已出版或已成书，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来港以后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二书。此二类之书，皆可谓为本书之纯哲学理论之基础所在。第三类为与本书同时，或继本书而写之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此共编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三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第四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中国哲学原论》中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之所以著。而此诸书，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哲学之基本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思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

第一类是唐先生的早期作品，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唐先生因个人所感的种种烦恼触发，遂用心于人生道德问题，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自我实有体知，而有《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等著述。这种存在的感受是唐先生最真切的体验，也是他的性灵之根，哲思之源，所谓“大概一个人遇到许多动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显出来”。唐先生很重视这种体验，曾谓他记述心情的一些文字，代表他生命与生活中的真实东西。童年时他见雨后地面裂开，即有担心世界毁坏的形上忧思。后于父子送别，居母丧时亦有大感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武湖之悟”：“乃吾一人行湖畔，见城墙上阳光满布，如一切有情生命皆一一成圣成佛於一无尽光辉之中，当时曾感一大欢喜”。这对唐先生思想的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后来的著述只是更加“充实而有光辉”，基本的思想方向这时已经确定了。

《道德自我之建立》出版后，获民国教育部一等奖。后唐先生谦辞，让予其所从学的汤用彤先生。于此可见唐先生的谦德与尊师之诚。《人生之体验》《人生之体验续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意味深隽。唐先生在书中把自己真心服膺、笃信的思想，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道理，循循善诱地讲说给世人。两书适合不同背景的国学爱好者阅读，可以用来了解唐君毅哲学，接近古人讲求的身心之学，读之可照察心灵，提撕精神，激昂志气，值得向大家推荐。

第二类虽是纯哲学理论的思考，但并非唐先生躲在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玄思。其实与第三类一样，同是出于作者深切的价值关怀。近代中国遭受了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被追求富强进步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全面批判。而对中国传统人文风教的怀念，是推动唐先生“谈一切世界中国之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第四类“中国哲学原论”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所谓“即哲学史以论哲学”。“原论”系列，除了推原哲学问题、名辞义训、推原思想义理的发展脉络，更重视推原不同义理型态的本旨，内在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探索义理分歧之原，“以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倘若哲思如剑，锋芒所至，义理分际一一斩截分明，已是不易。然而在唐先生看来，这尚在“方以智”一层，犹待进至“圆而神”之境。“圆而神”是指不但于同中见异，更能异中见同，见各义理型态的相摄相通。可见“原论”系列意在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客观呈现中国哲学史的整全面目，“展示中国哲学义理流行之不息”，“上下数千年哲学之慧命相续”，呈现中国哲学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原论”系列“大体只能当作rough work看，是需要修改的”（《中国哲学十九讲》）。意谓唐先生办行政，分散了心思，所以“有粗处”，倘专事撰著，是书当更加精纯。这么说当然不无道理，但也许是从自己的写书习惯出发的推测，并非知言之论，也低估了这些著作的价值。如唐先生自述“原性篇”的成书经过：“初非搜集资料，而后次第为之。乃先以数十日之功，一气呵成其大体。然后络续补正，更于校对时，字斟句酌；兼以目疾之故，悠悠四载，方得出版问世”，可见是书并非匆遽之作。

唐先生的文字风格多样，有抒怀式，反省式、辩论式、析理式、说教式、述学式等。熊十力先生曾批评他的文字“好铺排，缴绕复缴绕”。余光中说“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据唐先生自述，他的学术专著之所以缴绕其辞，碎义析理，曲折繁密而不免艰涩，是有意采取西方哲学著作的体裁所致。

唐先生论时贤往哲之学，力求不同义理型态的相摄相通，《庄子·大宗师》所谓“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正可概括唐君毅哲学的特点。唐先生深契于华严宗哲学、黑格尔哲学，唐君毅哲学综摄会通的特点，与这两种哲学的影响或许不无关系。哲学家通常不免有理执，故其蔽也深。唐先生则不然，作为哲学家的唐先生同时也是十分优秀的哲学史家，他对古今中西思想，都能平等加以尊重，并真实欣赏其长处，最能做到同情的理解。例如他对荀子、朱子的价值都有十分积极的肯定和维护。

唐先生晚年曾谓“说到工夫，我是不及格的”，又说“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其实唐先生于宋明理学，平生多有涵濡浸润之功，能体之于身心，见之于行事。他性情宽厚，自律甚严，对时贤往学具加尊重，胸怀光风霁月，有宋明儒者气象。他对儒学有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坚信儒家的价值内在于人心人性，他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从未灰心，相信“人心不死，此理必存，大道之行，终将有日”。

已有的唐学研究，和唐先生的学术史地位还不相称。文献利用的不便，或许是一个原因。借此新编全集出版，我希望唐学的研究能够更上层楼。唐先生相信，“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我想，用心阅读唐先生的思想遗产，读其书而怀想其为学为人，兴起复兴儒学之愿，必能与唐先生神契于旦暮。

（本文为《唐君毅全集》出版感言，题目为编辑所拟）

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胡可先著）正是利用石刻大宗之墓志来研究唐代的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会通问题

■卢盛江

胡可先教授前几部大作早就拜读了，新出的著作《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细致、开阔和会通。在这几个方面，可先教授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它利用新出的石刻文献，结合传世的文献，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史料依据，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和新问题。

就考订的细致而言，像具体诗人生平交游，家族谱系，还有文学情况等等，这方面做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本书考订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姓名的研究、籍贯的考证、家世的情况、科举的情况、交友的情况、仕历的情况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诗词的名物，诗词名物也是做得非常细致的。再如利用新出石刻对唐代的一些文献进行考证，即诗人著述的集部，一些诗集、一些诗篇，还有诗篇的背景，它的作年、作地、归属，还有文字的勘定，这些都是利用出土文献对唐代的诗歌进行考订的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视野的开阔而言，本书不仅仅着眼于一个个具体的诗人，而是从一个具体的诗人来着眼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学的情况。比较典型如说天宝，是从苑咸这个诗人的墓志来看整个天宝年间的政治和文学情况。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和天宝后的牛李党争。书中有关牛李党争的有好几篇，比如用很多墓志的材料来说明牛党是重科举的，这都是一些很实在的材料。在这个比较扩大的视野里面，他又侧重于家族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家族与文学因缘的情况，家族的风尚和皇室的因缘，家族政治与文学的交融，利用石刻文献研究家族里面的文学活动和社会上的一些文学活动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家族方面提出一些新问题，甚至其中有些问题是整个唐代的重要问题，比如说门阀世族向科举氏族的转化，这个题目做得很好，唐代到宋朝之间家族应该说是个转化，可先教授通过新出石刻的文献提出他的看法，非常难能可贵。另外他还提出唐代文学家族重视母系教育问题、重文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的提出都是非常新鲜的视角。

由考订的细致、视野的开阔，进而达到学术的会通。由本书得到启发，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在整个文学研究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关注一些小诗人，小作家。新出墓志虽有张九龄、张说、王之涣、韦应物这些大诗人，但大量的还是一些小诗人和小作家，这些小诗人和小作家原来并不受学术界关注，之所以不太关注系因为史料缺乏，新出墓志刚好弥补了这一空白，所以利用这个方面对小诗人和小作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是很大的。根据这些墓志透露的信息进行综合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往往不小，甚至可以说是宏大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会通式的研究。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既有关涉如王勃、杜甫、王维、王之涣、韦应物等大诗人的研究，而更多的是集中一些小诗人小作家的墓志，关注细节的问题，再融会贯通以探讨唐代文学家族的问题。因为以前有关家族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比较多的关注六朝门阀，接下来对宋代以后的家族也比较关注，而有关唐代家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而本书就是有唐代文学家族方面的会通式研究，是开拓学术境域的研究。从本书当中可以看到可先教授其实是用会通的方法、利用新出石刻来研究唐代文学家族的，有文史会通，史论会通，大小会通，古今会通。由此我们可以联想或拓展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用会通的眼光、会通的方法，在可先教授还有其他先生有关新出石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来进一步推动唐代以及其他时代的研究，比如唐以前的六朝，唐以后的宋代。因此，《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家族研究本身，对整个文史研究而言，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墓志文献的利用与学术研究的“预流”

■查屏球

石刻墓志的发现不断地增多，它的体量和规模已经形成了和传世文献相匹配的容量。清人所编的《全唐文》两万多篇，石刻文献现在发现大概在一万四五左右，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每个墓志出土以后，出土者、发掘者大都进行了整理研究，长期以来对这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强调它对传世文献互证的作用。我觉得这批文献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传世文献的互证，而要综合起来看，把这么大体量的文献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更原始、更直接的方式展示唐代历史文化信息，使得我们可以更立体化地认识唐代社会与唐人生活，这样为我们唐代文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对于我们研究唐代文史的人来说，20世纪这一代研究者是很幸运的，幸运就在于在本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唐代文史的研究开了一扇大门，同时敦煌学和唐代文史学成为传统文史学的一大显学。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我们国土的大量开发，包括房地产或者是水利工程的开发，地下各种各样的石刻文献都出来了，尤其是唐人的墓志出土量尤其庞大。当时在敦煌文献发现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就说利用新出土的文献研究新的问题，对学术研究来讲称之为“预流”。对今人来说，对唐代文史第二大文库即墓志的发掘发现如何去运用它，如何运用它去研究唐代文史的问题，应该也叫“预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可先先生的研究是“预流”之举，他的作品也算是“预流”之作，而《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就是他的代表作品，这是我对唐代石刻文献研究的一个个人认识。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新出墓志文献的价值以及它的研究方法探讨亟需要提升。在读可先先生前面著作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石刻文献是非常零散的，而石刻文献以墓志为主，墓志文献的语言是格式化的，它对人物评判的内容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对这样一种格式化、礼仪化的语言，我们如何去运用它其中有效的、有益的史学信息，探讨与之相关的唐人社会生活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对石刻文献的研究应该要上升一个层次，那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些零散的、格式化的文献提升到一种专题研究的高度，利用它对某一个专题展开综合性的研究。

可先先生的这本著作利用石刻文献来研究唐代家族问题、家族与文学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带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如何去提升我们关于唐代墓志文献、石刻文献的研究层次、研究高度，家族研究应该是一个方面。因为在这里涉及到文献出土的一种方式，古人卒后是按家族埋葬的，一个大的家族往往都有集中的茔地，发现一个墓志以后，连带这个家族的墓志就有可能发现。利用这种出土信息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家族石刻，以此来探究家族文化的构成，乃至家族文学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从这本著作上来说，利用石刻文献对唐代九大文学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系统化、立体化的家族文献材料，对我们继续拓宽研究路径，提升研究境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善于利用石刻文献这种格式化语言中所透露出来的零星的、却能够反映当时历史重大问题的一些信息，以开拓文史研究的新空间。比如书中揭载的《卢公亮墓志》，就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和其他史料相比，这一个墓志可能是最具有重磅效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影响中晚唐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牛李党争，史家推演到长庆元年那场科场案，司马光、欧阳修因为这场科场弄得两派人争论纷纷，对今天人来看觉得有点茫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当时直接的史料不多，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小说记载的，或者是后来宋代的史学家说的，当事人说的情况是很少。卢公亮墓志非常直接地展示了这场科场案的背景，因为卢公亮本身就是这场科场案的牺牲者。这个文献非常重要，对我们厘清牛李党争的来源是极其重要的史料。墓志文献中涉及到唐代的政治政变和政治事件，有些并不是像卢公亮墓志这样直接叙述的，因为当时背景也不能直接叙述，因而往往闪烁其辞，本书能够从闪烁其辞的墓志书写中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这种原创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大创获。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么从文学的角度去盘活大量的社科文献。我曾想做一个尝试，因为墓志文献有时间记录的，是从初唐到晚唐有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墓志又是格式化的文献，比如每个时期就像我们今天的网络用语有一个流行词，对层次越低的人，请托写作墓志者的水平也就越低，这种人只能用一种格式化的文本，但就是在这些低层次的墓志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每个时期最流行的话语词语。如果能够做这样一些尝试，把这些格式化的语言按照时间段排列出来，确实可以看出唐代文风前后流转的一些趋势。但是这种研究要做比较艰苦的工作，需要去统计这些大量的石刻资料，探寻其所预示的含义，把它归类。从这个方面值得去探索，就能够直观地发掘出当时文风用语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志是石刻文献，是原始的，没经过选择的，而实际上可能它就是那个时代最通行的语言，大家都用的东西，我们把它综合一下考察一下，就能够感受到当时文风的实际状况。我们的学者如果有志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预流”的工作，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新体系与新建构

■咸晓婷

胡可先教授多年来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墓志文献研究唐代文学，功力深厚，成果卓著。已经先后出版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和《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而这部《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无疑是其日积月累的水到渠成之作品，也是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论著。该著作以出土文献为基础，参照和印证传世文献，以重要的文学家族为切入点，研究唐代九个重要的文学家族，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考察唐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为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建构了新的体系。

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是该著的显著特色。新材料的发掘一向是推进学术研究重要的方法和手段，20世纪以来中国的唐代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新文献的运用居功甚伟。作者在这方面体现出前沿的姿态与穷尽的视野，这也是胡可先教授一贯的治学特长。新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新出家族人物墓志宏富而数不胜数，如此数量众多而达到相当规模的家族墓志群，这无论在唐代墓志研究史上还是在唐代家族研究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唐代家族承六朝门阀士族而来，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族研究一直是唐史研究的重镇，相对而言，家族历史学层面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如何研究家族文学却是一个虽有触及却尚未深入的领域。新著利用新出文献研究唐代文学家族，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墓志文学的研究。“家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无疑是新著最具开拓性的理论创新。这一概念由文学家族而出却以文学指归，将家族的文学研究概括和提升到新的理论层面。本书以家族墓志为对象，研究了丰富多彩的家族墓志文学，如文学家自撰墓志，家人或族人所撰墓志，包括墓主的兄弟、堂兄弟、子、侄、孙、外甥、女婿所撰墓志，父亲为子女所撰墓志，叔父为侄儿所撰墓志，合祔墓志、鸳鸯墓志，以及丈夫为妻子所撰墓志，妻子为丈夫所撰墓志等。阐释了这些家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家人、族人情感及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等。

第二，文学家族世系的梳理。该著作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先后梳理出韦氏逍遥公房、韦氏小逍遥公房、韦氏郧公房、河东薛氏、西祖薛氏、薛贻矩族系、杨汉公家族、杨嗣复家族、杨收世系、杜佑杜牧族系、王之涣家族、王勃家族、王维家族、唐代清河崔氏家族南祖房世系表、博陵崔沔家族、崔元略家族等诸多文学家族的世系表。补史传、《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之不足，家族成员的传承体系更趋清晰完整，为家族文学的研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家族文学人物的梳理及其文学成就的考察。该著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重要文学家族的文学人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详细考察了这些人物的仕宦、科举、交游、文学成就等。这些家族文学人物的梳理为学界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家族文学人物体系，而他们文学成就的考察也让家族文学图景更加清晰和细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传世文献中佚失的文学人物及其作品的挖掘。本书在这方面的价值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文学家族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研究。家族的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研究是家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家族人物文学个性的形成往往与家族的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等密切相关，而家族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考察也反过来为认识家族人物的文学个性提供了深厚的家族背景。家族教育方面，主要研究了继母教子与寡母教孤的士族母教。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这些家族人物的文学特性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其中包括像王之涣、王勃、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

第五，家族婚姻、科举以及家族与党争关系的研究。这几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唐代家族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及影响。士族婚姻重阀阅，唐人墓志在墓主婚姻情况的叙述上往往不惜笔墨，婚姻是维系家风和家族地位的重要方式。除了论述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之间的联姻，本书还研究了汾阴薛氏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的情况，弘农杨氏家族与诗人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联姻的情况，以及杜佑以妾为妻等问题，共性中又体现出不同地域家族、家族不同阶段乃至家族不同人物的个性，广阔全面而又丰富饱满。关于家族与政治的研究，本书着重论述了弘农杨氏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并进而推展到对中晚唐文学生态的考察。

此外，本书在利用新出墓志来补充和阐释经典作家和重要问题等方面也做出了精彩的考论，如“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以及杜甫咏书家和书法作品的释证等。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资料丰富、辨析细致、精审严谨的专著，体现出作者谨严的学风与文风。美中不足之处，以笔者的一孔之见，是对“家族文学”的研究有开创而研究尚不够充分，这可能受限于墓志这一对象材料，如能将家族文学活动以及家人书信、家人赠答唱和诗、家人祭奠文等其他文体纳入到考察范围，或许能让“家族文学”这一概念更具理论普遍性和学术影响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